

當代市場社會主義 所有制模式之理論分析*

梁文韜**

摘 要

前蘇聯、前南斯拉夫及其他東歐國家在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初所出現的鉅變，對西方的左派思潮有相當大的衝擊，並引發了不同的回應。一方面，對於傳統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這並不代表馬克思主義之失敗，原因是前蘇聯及其他東歐國家根本沒有經過資本主義進深發展的階段就貿然進入邁向共產主義的社會建設，而最終導致失敗是可以設想的。另一方面，鉅變亦促使部份社會主義者重新思考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可行政經模式，當中有論者積極提倡市場社會主義，更認定它為導引前蘇聯及前東歐共產國家從新發展社會主義模式的不二之選。市場社會主義者對如何建構後共產時代的社會主義政經模式提出不同的看法，但其共通之處在於堅持某種型式的公共所有制，本文分析主要市場社會主義政經模式中關於所有制形式的構想。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所有制、資本主義、共產主義、

市場社會主義

* 本研究接受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補助，計劃編號：NSC 91-2414-H-006-004，特此致謝。另外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本文的部份內容曾發表於由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主辦的「政治經濟學 - 哲學、制度與政策的對話」學術研討會(2003年9月27-8日)，在此特別感謝高安邦院長的指正。另外的部份內容亦曾發表於由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主辦的「政治經濟學學科定位研討會」(2003年10月18日)，感謝蔡昌言教授的寶貴意見。由於意識型態及政治上的限制，社會主義理論的研究在台灣一直沒有受到重視，這妨礙大家對西方政治思想的瞭解。直至近年，不少學者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然而，我們並不能把所有社會主義都歸到馬克思主義的傘子下。對市場社會主義以至其他社會主義的探討，應有助於國內對當代西方政經思潮的理解。

**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暨政治經濟研究所助理教授。

Political economy is a science ... of the unorganized national economy. Only in a society where production has an anarchistic character, do laws of social life appear 'natural', 'spontaneous' laws, independent of the will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 laws acting with the blind necessity of the law of gravity. Indeed, as soon as we deal with an organized national economy, all the basic 'problems' of political economy, such as price, value, profit, etc., simply disappear. He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men are no longer expressed as 'relations between things', for here the economy is regulated not by the blind forces of the market and competition, but by the consciously carried out plan ... The end of capitalist and commodity society signifies the end of political economy.

Nikolai Bukharin, *Novaya ekonomika*

(quoted in Nove, 1991: 13)

壹、導言

按照布哈林 (Nikolai Bukharin) 的想法，隨著共產社會的建立，政治經濟學亦會終結。共產主義的設想包括國家的消亡、私有制的煙滅、異化狀況的徹底消失、分工制度的剷除、市場及剝削的終結、共產主義的「人」的出現等。古典政治經濟學所關心的是商品的生產、交換與消耗，以及主導整個過程的價值法則 (law of value) 及其他法則。既然在共產主義社會中，人的需要不再透過交換得到滿足，產品亦不再是商品；另外，價格、市場價值甚至市場本身亦會隨之消失，那麼共產主義社會確實不需要政治經濟學。不過，這個看法並不意味馬克思主義者不談政治經濟學，事實剛好相反，馬克思本人及馬克思主義者都十分積極地討論政治經濟學，只是他們的主要目

的是批評從亞當史密斯發展下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亦即是他們所謂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

假如政治經濟學的範圍就像古典政治經濟學所制定的一樣，共產主義社會確實不需要政治經濟學，更不會有所謂的政經模式。可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有一個隱藏但卻十分重要的假設，亦即是私有制。馬克思及其追隨者的一個重要貢獻，是揭示所有制在政治經濟模式中應佔據核心位置。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所有制決定了政府角色、階級分野及收入分配上的差別。因此，所有制理應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討論重點。

對社會主義者（特別是市場社會主義者）而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並不完全等同於馬克思主義者所談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是歐美一個十分重要的思想傳統，而馬克思主義只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流派。社會主義的研究者或其信徒可以理所當然地談論政經模式，而政治經濟學更是不可或缺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一個最大分歧在於所有制，若要發展出有分別於資本主義的政經模式，所有制是核心的議題。

前蘇聯共產陣營的崩潰，令所有制議題成為社會主義能否找到出路的重要關鍵，不管是馬克思型社會主義或者是非馬克思型社會主義，都必須找出有別於資本主義政經模式的所有制。單純從理論的層次出發，政治經濟模式可以分為四種：資本主義、集權式社會主義（centralized socialism）、放權式社會主義（decentralized socialism）及共產主義，每一種模式都有其所有制形式。放權式社會主義又可分為兩類：民主計劃社會主義（democratically planned socialism）及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

本文旨在探討當代市場社會主義之理論模式。米勒（D. Miller）及皮爾遜（C. Pierson）指出：市場社會主義是一種把

社會(或公共)所有制及市場機制結合起來的政經制度(Pierson, 1995: 84; Miller, 1987b)。就市場社會主義的操作定義而言：市場社會主義是同時接受市場經濟及某種型態公共所有制的政經主張。

在前蘇聯及東歐共產陣營崩潰後，不少論者如柯奈(J. Kornai)提出由於市場社會主義在匈牙利等地方嘗試過並証實失敗，所以必須放棄對市場社會主義的冀望。唯市場社會主義者反對此種認為市場社會主義不可行的說法，他們聲稱真正的及完整的市場社會主義其實並沒有實踐過(Bardhan & Roemer, 1992: 102)。

本文的目的是評析自一九八〇年代開始直到現在各種主要市場社會主義模式中的所有制。討論焦點將放在當代而非較早期市場社會主義，原因是早期市場社會主義者如蘭格(Oskar Lange)所關注的並非公共所有制，而是社會主義經濟計算的可行性。¹

不同的當代市場社會主義理論雖同屬左派，但各理論模式則有其歷史及理論背景。本文第二節將探討當代市場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及理論背景，前蘇聯共產陣營的崩潰令部份馬克思主義者對歷史唯物論的信心開始動搖，他們或者放棄歷史唯物論及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或者是接受不可知論。不管是前者或是後者，馬克思主義者深入思考社會主義的可行模式，部份馬克思主義者如羅默(J. E. Roemer)則提倡市場社會主義模式。至於非馬克思型社會主義者，他們於八〇年代面對新右派

¹ 關於蘭格的想法以至他與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及海耶克(F. A. Hayek)的辯論，筆者亦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作了扼要的敘述(梁文翰，2003：51-53)。拉夫爾(Don Lavoie)對整個辯論作了非常詳細的分析及提出獨到的見解，見(Don Lavoie, 1985)。

挑戰之下，對社會主義理論作出深刻反省，部份論者如米勒積極也提倡市場社會主義。

由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差別在於所有制的不同，本文第三節將提出一個分析所有制的架構，並以之對資本主義、共產主義、集權式社會主義及民主計劃社會主義進行分析。

本文的第四節將探究主要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焦點放在所有制模式上。馬克思型及非馬克思型社會主義者因不同的理由先後提出市場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彷彿成爲後共產時代社會主義的不二之選。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大致上分爲三種，第一種是混合型市場社會主義，以洛夫(A. Nove)的理論爲代表；強調以中央擁有及管理的企業爲主，並輔以公眾擁有的企業及合作社企業，第二種是工人擁有及自治的合作社企業爲主，以米勒等的理論爲代表；第三種則以公眾擁有的企業爲主，以羅默等的理論爲代表。我們將會就這三種模式的所有制作出分析及比較。

本文在結論將指出即使歷史唯物論並不可信，市場社會主義者亦不能輕易否定其他政經模式在政治道德上的正當性。市場社會主義者必須指出我們爲何要選擇市場社會主義而非共產主義或自由資本主義。這須要進一步論証市場社會主義在政治道德上比其他意識型態更優越。從理論的一致性角度出發，各市場社會主義論者所提出的政治道德考量，是否能成爲他們所建議模式的規範性基礎，更是值得深入探討。這些都是進一步探討當代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議題。

貳、從馬克思主義到後共產主義時代的 社會主義

前蘇聯及其他東歐國家在十多年前出現的鉅變，不單促使自由主義倡導者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宣佈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的勝利，並斷言人類歷史已經終結；同時亦對馬克思主義者產生很大衝擊，迫使社會主義者重新思考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中間的可行政經模式。前蘇聯等地的失敗經驗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衝擊是無法避免的，它不單在實踐上讓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破滅，更在理論上破壞作為馬克思主義核心思想的歷史唯物論。按照歷史唯物論，社會的發展是從原始社會到封建社會，經過資本主義社會再進入社會主義社會，而最後過渡至共產主義社會（Cohen, 1978; Shaw, 1978）。前蘇聯等共產主義國家的失敗，揭示了歷史唯物論中的不可確定性，這裡所說的不可確定性要透過探討兩個社會發展的轉接點來加以闡述：第一是從資本主義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轉接，第二是社會主義社會過渡至共產主義社會的轉變。讓我們以這兩個面向來探討歷史唯物論中的不可確定性。

第一，我們能否確定一個社會的發展（如前蘇聯及中國大陸）不一定要經過成熟的資本主義階段，便可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理論上來說，馬克思主義者對這個問題有兩種不同回應。某些馬克思主義者的回應是：一個社會的發展一定要經過成熟的資本主義階段才可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前蘇聯等地的失敗經驗並不能否定歷史唯物論，原因是前述失敗經驗係源自於前蘇聯等國根本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業化過程。在經濟條件還未成熟的情況下，由封建農業社直接轉變為共產社

會，才會導致現代化發展停滯不前，最後引致經濟崩潰。另外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前蘇聯等地的經驗證明，一個社會不一定要經過成熟的資本主義階段，也可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時期，只要共產黨在該社會取得政權便可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以上兩種看法顯示，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第一個面向的問題並無共識。

第二，社會主義社會要發展到什麼程度才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更具體的說，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或史達林時代的蘇聯，是否已經進入了或接近馬克思所預見的共產主義社會？理論上，馬克思主義者對這個問題亦有兩種不同回應。某些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或史達林時代的蘇聯並不是馬克思所預見的共產主義社會，原因是物質生活並不夠豐足，技術發展也不夠先進。不過，即使我們以物質生活是否豐足及技術發展是否先進作為標準，似乎亦無法確定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物質生活要到達何等豐富，及技術發展要到達何等先進的地步才算是共產主義社會。另外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或史達林時代的蘇聯已接近馬克思所預見的共產主義社會，原因是私有財產制已經被取代；其後的失敗是由於工人革命沒有傳播至全世界。此兩種回應顯示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第二個面向的問題也沒有共識。

以上兩項的不確定性，是針對大家認為曾經出現過的社會主義社會而言。這兩項不確定性對歷史唯物論中的科學性產生了一定的衝擊，原因是我們無法以大家都同意的客觀標準來判斷社會的發展過程。另外的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則並未直接回應上述的不確定性，反而較關心為何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並未以歷史唯物論所預期的方式發展。

傳統馬克思主義者無法解釋：為何個別社會的發展過程跟

歷史唯物論所預期的有這麼大的分別？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柯亨（G. A. Cohen）在近著中認定歷史唯物論是失敗的，原因是它不能解釋為何西方國家並未朝共產主義社會方向發展（Cohen, 2000）。柯亨認為他原先贊同歷史唯物論中的「不可避免說」（inevitablilitarianism）是錯誤的。這個學說預測勞工階級的大小、組織及不安穩性會逐漸增加，但物資會愈來愈充裕，柯亨指出這兩個預測都已被証實是錯誤的。據此而論，由於預測上的錯誤，歷史唯物論也就無法成為科學的社會理論。由於不少馬克思主義者對歷史唯物論失去信心，因此他們近年關注的重點也從歷史唯物論及階級等概念轉向政治道德考量。對柯亨來說，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所能做的，是以平等主義的政治道德考量來改良資本主義。

另外的一些傳統馬克思主義者如奧曼（B. Ollman）及曼度（E. Mandel）等則並沒有完全放棄歷史唯物論。他們認為，柯亨關於歷史唯物論是失敗的結論可能過於武斷。即便歷史唯物論並非完全正確，將來亦會出現「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可是他們沒有提出要如何建構社會主義。

還有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則先將關於歷史唯物論的爭議擱置。對他們而言，上述不可確定性及柯亨的質疑並不必然意味歷史唯物論是錯誤的。歷史唯物論並不能被證明是對還是錯，馬克思主義者根據不可知論（agnosticism）強調，我們並不知道將來會否出現共產主義社會。羅默似乎持有這個態度（Roemer, 1988），這類馬克思主義者的做法顯得比較踏實，他們選擇致力於尋找社會主義的可行模式。

以上是馬克思主義者對前蘇聯共產陣營崩潰後的主要回應。在前蘇聯共產陣營崩潰前，不少非馬克思主義者便已提出市場社會主義作為建構可行社會主義的藍本，在探討非馬克思

主義者提出市場社會主義的背景前，我們先介紹馬克思主義者對市場社會主義的三種基本看法。

第一種看法是漠不關心，由於歷史唯物論的失敗，部份馬克思主義者因而接受混合型經濟的現實，對他們而言，市場社會主義並非重要議題，這似乎是柯亨的立場。

第二種看法是堅決反對市場經濟，例如曼度批判市場社會主義，堅決反對市場，認為市場無可避免地是屬於資本主義的 (Mandel, 1986: 17)。

第三種看法是認為在特定時空背景下市場社會主義是不可避免的。根據羅勒 (J. Lawler) 的分析，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及其他著作中扼要地闡述近似市場社會主義的意念。因此，對馬克思來說，資本主義、市場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是歷史發展中相繼出現的三個政經模式 (Lawler, 1998: 24ff)。這些文獻中的「發現」為馬克思型市場社會主義提供在現階段支持市場社會主義的理據 (梁文韜, 2003: 48-50)。可是，在馬克思型市場社會主義者當中，只有少數人真正用心探討市場社會主義模式。羅默是馬克思型市場社會主義者中一個重要的代表，我們稍後會作進一步探討。

市場社會主義者不一定是馬克思主義者。事實上，大部份市場社會主義者都屬於非馬克思型，如早期的蘭格及近期的米勒等。蘭格在 1936 年發表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意圖駁斥奧地利學派中米塞斯及海耶克等人對計劃經濟的批評 (Lange, 1964: 57-143)。²米塞斯提出任何建立所謂社會主義經濟的試圖

² 蘭格的理論有其發展的歷史背景，國家社會主義下的純中央計劃經濟從 1930 年初在前蘇聯開始實踐後一直受到批評。對計劃經濟的最嚴厲的批評來自屬於奧地利學派的海耶克 (F. A. Hayek) 及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

都會落空，原因是沒有經濟計算就沒有經濟，而在中央計劃下經濟計算是沒有可能的（von Mises, 1935: 105; 1981: Part II）。海耶克亦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可能生存的（Hayek, 1978: 303; 1948: 119-147, 148-180, 181-208）。蘭格認為民眾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會產生供應和需求，這兩者決定價格。價格繼而決定資源配置，也決定部份收入分配。

蘭格指出，即使所有資產所有權歸國家所有，個人只佔有消費品的所有權，只要利用「反覆試驗法」（the method of trial and error），同樣可以讓價格機制發揮配置資源方式。正因為社會主義可以實現按價格最優配置資源，所以社會主義可以存在（梁文韜，2003：51-53）。蘭格所關注的是經濟計算的可行性，而並非公共所有制，他進一步假設國有制的合理性，而我們所關心的是國有制以外的公共所有制，故不會探討其理論。

至於當代非馬克思型市場社會主義中，擁護者有一個共同目的，就是找出一種有別於前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政經體系，唯個別論者的背後信念並不盡相同。米勒及伊斯甸等人提倡市場社會主義，是為了解決新右派自七〇年代末開始對左派所帶來的衝擊，其理論有費邊主義的色彩。³洛夫則從他身處的英國當時所實踐的混合型經濟出發，批判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模式，並提出混合型市場社會主義模式。至於史威卡特的意圖則比較理論性，他嘗試論證在道德考量及經濟考量上，市場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勝。儘管當代非馬克思型市場社會主義者對

³ 在利格蘭及伊斯甸所合編的《市場社會主義》一書中，作者們的目的就是為了在英國工黨於 1983 年連續第二次敗給保守黨後重建社會主義理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們是費邊社的社會主義哲學小組的成員，該書正是他們從八十年代中後期的討論結晶。根據他們合寫的前言中的宣示，該書是合力反擊新右派的成果，在米勒的意念啟發下指向市場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Le Grand & Estrin, 1989: v-vi）。

如何實踐市場社會主義有很大的分歧，但他們都普遍認為市場社會主義模式是可行的（“feasible”或“viable”）（Nove, 1991: vii; Schweickart, 1993: x）。

相對而言，前蘇聯共產陣營的崩潰對非馬克思型市場社會主義者的衝擊遠低於對馬克思主義者的衝擊。非馬克思型市場社會主義者從一開始就對歷史唯物論作出否定或置之不理，又或者是認為歷史唯物論並不是能用來建構社會主義的科學理論、認識論或歷史發展論。另外，他們甚少運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及社會學的元素，其中與階級有關的概念及理論也甚少觸及。

值得注意的是，非馬克思型市場社會主義者早在前蘇聯共產陣營崩潰之前的八〇年代初，就開始著力建構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當然，這並不表示他們對蘇聯模式的失敗無動於衷，事實剛好相反，他們都深受啓發（Nove, 1991: xi; Schweickart, 1993: xi）。不過，蘇聯模式的失敗似乎反而印證了他們的信念，而他們的基本想法在共產陣營崩潰的前後無太大分別。⁴

以上的討論勾劃了當代市場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因素及理論背景。馬克思型與非馬克思型市場社會主義同屬左派思想，兩派雖然有不少的差別，但是亦有一定的共通之處。在制度層面上，任何政經模式中都有兩個重要的元素：（1）經濟活動是透過計劃機制還是市場機制，及（2）所有制模式。兩派之間最明顯的共通點是反對國家計劃經濟，至於在所有制的立場上，兩派的共通點是在國有制以外尋找別的公共所有制模式，

⁴ 關於米勒的理論，我們可以比較 Miller（1987a, 1987b, 1989）及 Miller（1991/1994）；洛夫方面，我們可以比較 Nove（1983, 1987, 1988, 1989）及 Nove（1991）；至於史威卡特，我們可以比較 Schweickart（1980）及 Schweickart（1993）。

這是爲什麼市場社會主義之所以是社會主義的原因。

什麼是社會主義？一般的定義把社會主義界定爲支持國家擁有生產工具及推行計劃經濟的政經主張。很顯然，這定義是受到馬列毛思想的影響，接受此定義亦即是等於否定市場經濟。所有社會主義都反對資本主義，但其具體建議則大不相同。縱使我們接受某一定義，該定義裡的不同元素仍有待深入解釋。以上述定義爲例，「公共所有」是什麼意思，就容許多種的理解。社會主義中的主要爭論不單在於市場與官僚規劃的對立，亦在於公共所有制與私人所有制的分別。不同的社會主義都接受某種型態的公共所有制，但不能將社會主義與國家所有制劃上等號，亦不應將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劃上等號。

市場社會主義所有制是稍後的討論重點，但在深入討論市場社會主義所有制模式前，我們在下一節先提出分析所有制模式的方法；而爲了凸顯市場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特色，我們將先行分析其他政經模式的所有制。

參、公共所有制、集權式與放權式社會主義

不同的政經模式建議不同的所有制，若要分析各種模式的所有制，我們可以引用著名法哲學家漢奈爾（A. M. Honore）對所有權的詮釋。漢奈爾就所有制中隱含的權利作出精辟的分析，對某一物件的所有權的訴求包括（Honore, 1961: 112ff）：

R_1 ：佔有權（the right to possess）

— 對該物件的排他性控制權

R_2 ：使用權（the right to use）

— 使用該物件的訴求權及使用該物件時的享用權

R₃：管理權（the right to manage）

— 決定使用該物件的目的及誰可以使用的權利

R₄：收入權（the right to the income from the thing）

— 合法使用該物件下的收入的擁有權

R₅：根本權（the right to the capital）

— 有完整的能力及自由去出讓、消耗、浪費、改變及摧毀該物件

R₆：安全權（the right to security）

— 免於他人徵用或徵收該物件的權利

R₇：移贈權（[the right to] transmissibility）

— 將該物件轉贈的權利

除了以上的各種訴求外，漢奈爾還提出兩項限制條款：（1）禁止有害使用—亦即是使用該物件時不得侵犯他人的權利，（2）對債務及稅收的負擔—亦即是該物件在必要時將用以抵償欠債及稅款。設置這些限制條款的目的當然是為了確保任何人在運用或保持其權利的同時能保障其他人的權利。任何政經模式的所有制對上述的訴求及條款都必須要有具體的安排。由於關於兩項限制條款的爭議不大，我們主要集中討論與權利訴求相關的議題。

如前所述，從理論的層次出發，我們可以確認四大類別的政經模式：資本主義、集權式社會主義、放權式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雖然我們的討論重點是市場社會主義，但是若要了解市場社會主義，特別是它作為放權式社會主義在所有制上的特點，我們必須先了解其他政經模式的所有制。關於所有權的討論有兩個主要面向：第一個面向是「誰的所有」，第二個面向是「擁有些什麼權利」。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活動是透過市場機制進行，一小撮擁有生產工具的人僱用出賣勞動力的人，而國家透過保障私

有財產及契約制度來維持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下私有制的特點在於個人可以擁有上述全數的權利訴求 R_1 - R_7 ，而最讓社會主義者詬病的是生產工具由私人所有。社會主義者當然不反對我們對基本必需品及眾多日常生活產品有完全的所有權，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差別在於前者對生產工具擁有全數的權利訴求，而無產階級則只有部份的使用權。嚴格來說，無產階級工人們沒有收入權 R_4 ，這不是說他們沒有收入，只是其收入與生產工具所有權無關，原因是他們所謂的收入是以販賣勞動力而來，是先於產品的製造及其後產品以商品形式販售的過程。資本家是否能將商品出售以至在出售時的價格是否能讓他從中獲利等考量跟工人們的收入沒有直接的關係。即使資本家可能會虧本，亦必須支付他在契約中所承諾員工的工資。

在集權式社會主義社會中，政治上實行中央集權，經濟活動是透過中央控制的計劃機制進行，而所有制則實行國家所有制，重點是生產工具乃國家擁有，並由國家委派幹部管理，國家所有制的特點在於國家可以擁有關於生產工具的上述全數權利訴求 R_1 - R_7 。嚴格來說，與資本主義下的工人比較，集權式社會主義社會下的工人們一樣沒有收入權，這並不是說他們沒有收入，只是其收入與生產工具的所有權無關，原因是國家分發給他們的所謂收入是他們透過為國家貢獻勞動力而「賺」來，是先於產品的製造及其後以商品形式販售的過程。國家是否能將商品出售以至在出售時的價格是否能讓他從中獲利跟工人們的收入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即使國家可能會虧本，亦必須支付員工在契約中承諾工人們的工資。

至於在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中的所有制，馬克思並沒有仔細描述共產主義社會應如何運作，不過，我們可以從共產主義

的理想推敲。假如國家的消亡、階級分野的清除、私有制的湮滅及分工制度的剷除等共產主義理想真的獲得實現，那麼全民所有制是可以預期的所有制模式，意思是關於生產工具的所有權利訴求 R_1 - R_7 都是全民所有的，亦即是說，生產工具乃全民共同擁有及操控，而國家逐漸被自治團體取代。至於消耗性的個人必需品及日常用品，個人則擁有其所有權的。最後，由於是實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的原故，也就沒有貨幣制度，亦無什麼收入權的爭議。

不過，對不少西方社會主義者來說，共產主義根本就不可行，他們希望發展出有別於自由資本主義及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體。在另一邊廂，對於很多前南斯拉夫及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者來說，他們當時所面對的問題反而是如何發展非蘇聯式社會主義政治經濟體。基於不同的考慮，東西方的社會主義者都不約而同地指向放權式社會主義。在此我們不必深入討論放權式社會主義在中國大陸、前南斯拉夫、匈牙利及其他前東歐共產諸國的實踐模式，這不是說對實踐的瞭解並不重要，而是本文的重點不是實踐模式而是理論模式。⁵

至於前述的兩種放權式社會主義，民主計劃社會主義及市場社會主義的相同之處在於它們都接受某種形式的公共所有制，而兩者的區別在於透過什麼機制來進行經濟活動，民主計劃社會主義者主張透過大眾的民主參與來規劃大部份的經濟活動(Albert & Hahnel, 1988, 1992, 2002; Campell, 2002; Devine, 1988, 1992, 2002; Laibman, 2002)。民主計劃社會主義者對市場持有保留的態度；相對而言，市場社會主義則主張透過市場來聯繫經濟活動。在放權式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工具乃公眾共

⁵ 筆者曾經就中國大陸的市場社會主義作出探討，並指出中國大陸已於九十年代後期脫離社會主義而步入資本主義，見(梁文韜，2001)。

同擁有及操控，政治權力下放。作為放權式社會主義的一種，民主計劃社會主義接受社會所有制。然而，眾多論者中只有少數如迪凡因（P. Devine）曾經就所有制作出討論。

根據迪凡因的想法，企業由利害相關者擁有，當中包括企業員工、主要原料供應商、產品使用者、企業所在的地方政府等（Devine, 2002: 77ff）。在迪凡因設想的民主計劃社會主義中，佔有權、使用權及管理權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分散於社會各層面。不過，民主計劃社會主義有待進一步發展，單從現有的理論很難作出具體的分析。然而，有一點我們清楚的是，民主計劃社會主義的社會所有制亦算一種公共所有制，其背後的信念是任何受到企業財產使用的結果所影響的人或機構都應該分享所有權（Devine, 2002: 76）。這種想法很顯然是為了配合對整個經濟體系進行民主控制的信念，可惜的是，迪凡因沒有仔細說明社會所有制與民主計劃經濟兩者之間的理論關係。

市場社會主義跟民主計劃社會主義不相同的地方在於前者認定市場是經濟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一般而言，市場在實際操作上有三種作用：（1）作為一種提供所需物品及服務的方式；（2）作為一項分配及籌措生產資源的機制；（3）作為一項決定生產成果及資產如何分配的機制。資本主義市場包含這三種作用；但在集權式社會主義下，市場受到相當大的局限，特別是資本市場（Brus, 1990; Brus & Laski, 1989: Chap. 9）。民主計劃社會主義者與市場社會主義者對於應如何看待市場有不同看法，有待日後進一步的探討。以下的討論重點在市場社會主義所有制。

肆、當代市場社會主義的理論模式

一、政治道德考量

在設計市場社會主義模式時，部份論者否定市場社會主義充其量是邁向共產主義的一個步驟或過渡性階段的看法，他們十分著重規範性的考量。但部份傳統馬克思主義者亦是基於規範性考量來反對市場社會主義。他們所反對的是市場經濟及其帶來的不良後果。對傳統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市場社會主義違背社會主義消滅剝削及剷除異化的目標，他們質疑為何市場社會主義可以被稱為「社會主義」(Mandel, 1986, 1988; Ollman, 1998)。

市場社會主義者之所以提倡某種形式的公共所有制是要減少剝削及降低異化的影響。自由、平等、民主及社會正義等都是市場社會主義者所擁抱的價值，目的是要爭取穩定的及能順利運作的社會主義社會。皮爾遜指出市場之所以被推薦，是因為它是一種在社會主義之下獲取更大經濟效率的方式，亦是一種確保更大的個人自由、更多的民主和更完善的政經模式 (Pierson, 1995: 84-5)。雖然社會主義標榜平等主義，但是它與市場體系並不矛盾 (Baker, 1987)。市場社會主義設法實現平等、民主和團結這些傳統的社會主義目標，而同時又保持經濟效率，方法是保存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主要特徵：市場，以及取代資本主義的另一個主要特點：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市場社會主義者一致認為整個經濟體系採取中央規劃是不太可行的，但與此同時，他們亦深信市場失衡導致企業壟斷、貧富不均等嚴重問題。市場社會主義的重點是讓市場導引經濟活動，

提倡某種形式的公共所有制，而對公共所有制的設計卻容許多種可能性。

市場社會主義者對公共所有制的理解並不一致，所有制中最重要的一項元素是企業模式。市社會主義主要接受三種企業的存在：(1) 國家企業，(2) 合作社企業及(3) 公眾擁有的企業。不同的市場社會主義對這幾種企業的態度上的差異決定不同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市場社會主義者嘗試提出不同的模型，以不同形式的所有制來劃分的話，大致上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混合型，以中央擁有及管理的企業為主，並輔以公眾擁有的企業及合作社企業，洛夫是提倡這一種模式的代表。第二種是工人自治的合作社企業為主，除了米勒外，主張這一種模式的代表人物包括伊斯甸 (Saul Estrin)、史威卡特 (David Schweickart) 及威斯哥夫 (Thomas E. Weisskopf) 等。第三種是以公眾擁有的企業為主，除了羅默外，巴肯 (Pranab Bardhan) 也是鼓吹這一種模式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容許小型的私人企業的存在 (Nove, 1991: 213; Bardhan & Roemer, 1992: 108)。我們將對這三種政經模式作出分析，重點放在後兩種模式上，原因是關於這兩種模式的理論比較具體。

二、企業模式與洛夫的混合式市場社會主義

早在 1983 年洛夫便已經質疑集權式社會主義的政經模式的可行性，及至前蘇聯及其他東歐共產國家的崩潰讓洛夫的立場變得更堅定。他一方面否定馬克思型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設想，但另一方面卻維護社會主義。洛夫認為馬克思型社會主義中設想的目標是不可能達到。勃斯 (W. Brus) 在討論洛夫的理論時曾經表示不可行並不是問題的重點，而事實上計劃經濟

是可行的 (Brus, 1985: 46)。沒有人會否認計劃經濟不單曾經出現而且還在某些國家中實踐過，勃斯沒有瞭解到洛夫所關心的是共產主義目標的可行性而不是計劃經濟的可行性，勃斯似乎錯誤地把共產主義與計劃經濟畫上等號。勃斯與洛夫兩人所關注的重點並不相同，真正的問題應該是到底以計劃經濟方式能否達到共產主義目標。對某些馬克思型社會主義者來說，答案是肯定的。

洛夫對馬克思主義批評的重點是馬克思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若不是不相干就是引導錯誤，原因是它已經假設共產主義經濟不會有問題 (Nove, 1991: 63)。共產主義是社會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階級鬥爭基本上已經消失，但這並不表示當時不會有生產及分配的問題。以資源分配為例，即使採納了馬克思所倡議的「各盡所能及各取所需」原則，大家對什麼是各人之所需的理解有不同想法，只要有做集體決定的需要，就難免有不同意見、問題及衝突。

洛夫所倡議的並不是全盤否定計劃而是平衡市場與計劃。根據洛夫的想法，市場與規劃如何平衡要視乎經濟體系的發展與大小。從這個角度出發，對於規模大的及在發展中的經濟體系如中國大陸來說，市場是不可或缺的。洛夫不能接受在現代工業社會中以事前 (*ex ante*) 規劃可以替代以市場作為事後 (*ex post*) 聯繫的想法，他認為這只是一個假像 (“illusion”)。不過，艾絲頓 (Diane Elston) 錯誤地批評洛夫，以為在他的理論中除了市場及官僚規劃外別無他法 (Elston, 1988: 3)。

洛夫的雙重模型 (“dual model”) 包含一個以中央規劃為主導的主區域 (“dominant realm”) 及一個以市場為主導的次區域 (“subordinate realm”)，國家的角色必須佔非常重要的地位 (Nove, 1989: 98-109)。他列出五種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產媒介：中央擁有及管理的國家企業、工人自主管理的國家企業、合作社式企業、小型的私人企業以及自僱人士 (Nove, 1991: 213)。從洛夫的角度看，將國有制定性為社會主義的必然構成因素是錯誤的，放權式社會主義提出與集權式社會主義不同的想法，亦即是實行生產工具社會化而非國有化。社會化並不單

是法律規定下的一個財產系統而已，它是一個讓民眾富強的制度。由於重要企業是國有的或公眾共同擁有而不是私有的，故此這個模式算不上是資本主義。在洛夫的理論中，市場及計劃經濟的元素互相結合。洛夫的模型在很大的程度上排除私有制，可是他並沒有提出具體的答案去解決一方面堅持所謂的公共所有制而另一方面則接納市場。另外，由於其經濟學的背景，洛夫沒有具體談論他所提出的模式背後的政治道德基礎。

相對於洛夫的模式，米勒、伊斯甸及其他贊成以合作社企業為主的市場社會主義者則較著重政治道德的規範。米勒認定民主（經濟及政治）、自由（包括對自主的考量）、正義（包括對平等的考量）是重要的政治道德理想（Miller, 1989a: 14；梁文韜：56），而採納合作社企業為主的政經模式就是要體現這些理想。伊斯甸亦指出開拓實現民主的空間至工作間、減少收入不平等及降低異化的程度是實踐以合作社企業為主的所有制的目標（Estrin, 1989: 170-172）。

三、合作社企業與經濟民主

米勒設想一個以工人合作社為主的市場社會主義政經模式，每家企業都按照工人合作社形式建構的（Miller, 1989, 1991/1994）。工人合作社在自由市場上競爭，並自行決定產品種類、生產方式及價格等。從所有制的角度分析，工人集體擁有相關的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源。按照漢奈爾的所有制模型來分析，從佔有權 R_1 到移贈權 R_7 等七種權利基本上都是集體擁有，至於如何及誰來使用生產工具則由整體成員以民主方式來決定。每家企業由所有員工進行民主控制，他們就各種問題作出決策，其中包括合作社內部的收入分配。員工享有收入權 R_4 ，個人工資收入一部份透過市場標準訂定，另外一部份則是從利潤所組成的集體資金中拮取。企業的資本是從外在的投資機構借貸而來，並按某一固定利率付出利息。企業對所借的資本享有使用權 R_2 ，但並不享有完全的所有權，既不可以出讓，亦不

可以移贈。這意味著它們的固定資產必須保值，既不能把資本視作收入，亦不能將其放貸給其他企業。米勒所鼓吹的所有制模式與伊斯甸所提倡的南斯拉夫型合作社模式十分相似（Estrin, 1989: 172ff）。

米勒的政經模式有其破產規則，亦即是當企業無力向其成員發放維持生計的收入時，就必須停業，工人則轉進其他合作社或合組新的合作社。每一間企業都必須維持其民主形式，假如企業要擴充，招納新成員後要將他們視為正式成員，享有平等的投票權。由於受限於這個條件，它可以選擇不同的內部管理結構。小型合作社一般通過全體員工大會來決定大多數問題，而大型的合作社則確立一套更複雜的制度，如成立類似執行委員會的組織。很顯然，管理權 R_3 是由全部員工所共同擁有。

在米勒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中，國家可以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但它不會試圖直接訂定生產計劃。國家的職能只局限於確定市場架構的完整性及合理性，從而讓整個經濟在很大的程度上服膺於社會主義的平等目標。這個職能的一個重要元素是投資管理，這項工作由私營銀行或公共投資機構承擔。米勒所設想的私人銀行並非典型的資本主義私營銀行，其中有一定數量的股份是公共機構及合作社企業所持有（Miller, 1994 [1991]: 258）。

投資銀行的工作是為現有的以及新組成的合作社提供資本。市場社會主義的投資銀行在扶植新的合作社這方面起了積極的作用，銀行將尋求新工作的人組織起來成立合作社後，就必須將合作社的管理工作交給其成員（Miller, 1994 [1991]: 259; 1989: 312）。按照漢奈爾的所有制模型來分析，這些投資機構對資本擁有使用權 R_2 、管理權 R_3 及收入權 R_4 ，亦即是有權利替股東善用資本及可以使用其資本於協助合作社企業，從而賺取利息。不過，它們對合作社本身沒有使用權 R_2 及管理權 R_3 。

米勒認為這些投資機構的目的並不單單是利潤最大化，投資機構的決策不僅應考慮個別企業的商業能力，還應考慮一些

更廣泛的因素，尤其是防止市場支配能力過於集中，使經濟保持競爭狀態，以及維持不同地區之間就業平衡等因素。投資機構向企業提供價格、市場趨勢等訊息，這些訊息對需求最大的行業和地區組建新合作社方面有催化的作用。

另外，國家負責確立最低收入水平，如果某家經營不善的企業在短期內無力發放最低工資，國家須要負責維持這些成員的生計，從而使新的產品得到發展或者讓企業改組工作得以推行。除了上述職能外，國家還要繼續提供其他福利。米勒認為推崇市場社會主義，並不是要迷信市場。市場是提供日用商品和日常服務的有效手段，但是界定市場應當如何運作是一個實踐上的問題，而非原則上的問題。

威斯哥夫所建議的模式將政治民主與經濟自治相結合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Weisskopf, 1992, 1993, 1994）。他認為民主自治的市場社會主義綜合各種社會主義理論的長處，其模式包括四個方面：（1）自由與民主的政治制度，（2）企業及其收入的社會所有及控制，（3）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機制，（4）國家在政經決策上的積極作用。民主自治的市場社會主義的特點是企業的民主自治，企業的所有成員按照「一人一票制」原則選舉企業管理委員會，企業經理由委員會雇用並對其負責。

另外，員工可以自由退出企業，放棄其投票權並可以把自己利益相關的票證兌換成現金。在這一點上，威斯哥夫的模式有別於米勒等人的模式，員工在威斯哥夫的模式中對企業分享直接所有權，但在米勒的模式中沒有成員本身的直接投資，因此個人對企業資產沒有任何權利，合作社企業在沒有虧損的情況下結束，成員們不能分享任何資產，個人若要離開亦不能領取任何現金。在威斯哥夫的模式中，企業採取民主方式決定收入分配的政策，與米勒的想法類似。

至於企業資本的主要來源則是：（1）從其他企業借貸資金，（2）從獨立的民主自治的銀行或其他金融仲介機構借貸資金，（3）通過向獨立的社會共同基金和外國投資者發行無投票權的可交易的有價證券獲得資金，（4）將企業的營餘重

新投資。

威斯哥夫模式的最大特色是收入社會化，每一個成年公民對任何企業的收入都享有平等的權利要求。換句話說，民眾對所有合作社企業所擁有的生產工具及其他生產資源享有收入權 R_4 。另外，威斯哥夫認為實行積極的經濟政策及提昇企業的生產效率雙管齊下可以達到最理想的經濟表現。威斯哥夫認為這種模式應該是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採納市場經濟的最佳選擇，而這些國家不應走上資本主義之路。

史威卡特倡議注重經濟民主的市場社會主義，希望同時兼顧效率和公平分配，與上述的模式十分類似。早在 1980 年代初，他就提出「工人控制」(workers' control) 模式 (Schweickart, 1980)。史威卡特前南斯拉夫式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為藍本，並在前共產東歐劇變後轉而用「經濟民主」概括自己的模式。對真實存在過的社會主義政經模進行反思後，史威卡特提出真正的社會主義在經濟領域內必須有效處理三個問題：(1) 勞動的異化，(2) 生產的無政府狀態，(3) 官僚主義的低效率 (Schweickart, 1993)。他認為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是將計劃和市場有機地結合起來，並落實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

史威卡特的經濟民主模式的三個基本特徵是企業自治及市場經濟。按照漢奈爾的所有權模型來分析，在史威卡特的模式下，企業由勞動者自己管理，但是他們並不佔有生產資料，亦即是沒有佔有權 R_1 、根本權 R_5 及移贈權 R_7 ，生產工具是社會的集體財產，他們只有使用權 R_2 、管理權 R_3 及收入權 R_4 。市場經濟逼使自治企業追求利潤，但利潤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利潤，而是產品的價值與扣除工資後的生產費用之間的差額。對史威卡特而言，企業自治的目的就是為了揚棄勞動的商品化和異化。

在資本來源這一點上，史威卡特的模式與米勒所提出來的模式有所不同。投資資金的主要來源為資本稅，資金的分配是由國家級、地方級及社區的立法單位來決定。不過，這些不同層級的立法單位並不是直接以民主方式來分配資金，而是決定如何將資金分配予各級銀行，而這些銀行進一步將資金分散地

投資於其附帶企業或協助新的合作社企業。史威卡特建議對所有新投資作出有效而民主的社會控制，為社會發展及經濟成長提供指引，投資決策由一定的代表機構民主地訂定。

市場社會主義不僅要政治民主化，而且要在經濟效率上超過資本主義。史威卡特認為透過他提出的模式可以有效地確保社會主義發展的方向並克服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根據他的想法，經濟民主模式一方面既實現經濟民主，亦確保政治民主，另一方面將計劃和市場結合起來。史威卡特指出企業自治和全社會的計劃投資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找到了新的實踐模式，而經濟民主又為更高的生產效率提供了保證。當然，在實踐上是否如史威卡特所想像的那麼有效率則有待驗證。

綜合以上的分析，米勒、威斯哥夫及史威卡特所設想的模式是以前南斯拉夫自治式合作社為基礎，不同模式有相似的地方，都是企業民主加上某種型態的社會所有制。可是他們似乎沒有非常認真地去探討為何前南斯拉夫的自治式社會主義在1980年代末會出現那麼嚴重的經濟問題，以至最後崩潰。柏卓韋治（Svetozar Pejovich）曾精辟地指出在政治上，前南斯拉夫的問題是由於政府管理不當，補救措施不當。另外，工人民主自治的政經體系所制定的財產結構無可避免地增加了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及負面意欲（“negative incentives”），而這導致高通脹、失業率增加及收入下降等問題（Pejovich, 1990）。在此我們無法深究前南斯拉夫模式在實踐中所遇到的問題，重點是米勒、伊斯甸、史威卡特及威斯哥夫等在其眾多著作中都沒有在這方面作出深入的討論。與前南斯拉夫模式不同的是，米勒等嘗試運用較先進及嚴謹的金融體系來為合作社提供資本。不過，若以他們所設想的模式作為實踐的藍本會否犯上前南斯拉夫的錯誤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四、票卷經濟與利潤分散

根據社會所有制，資本及生產工具是整個社會集體擁有

的，並由不同組合的工人管理。迪傑斯（Anthony de Jasay）對此作出批評並提出反問：「什麼是『社會』？」、「它不就是由擁有最高代表性的國家所代表的嗎？」、「我們如何能設想社會所有制下沒有國家來行使擁有權？」。他認為假如擁有者並不是社會中的一個小集合而是社會全體，所謂的社會擁有即是國家擁有，社會擁有者的決定亦是政府的決定。另外，即使自我加諸的限制不會把市場社會主義下的市場局限在消費品，所謂的社會所有制也會造成這個後果（De Jasay, 1990: 18）。

迪傑斯的想法不無道理，社會所有制原則上應該排除資本市場的存在，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生產工具的市場，這樣的話市場社會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的分別似乎並不大。迪傑斯所質疑的是市場社會主義者認為社會所有制與市場相融的想法。換句話說，除非市場社會主義者放棄社會所有制，否則他們難以誠心地接受市場。相對於米勒、史威卡特及威斯哥夫的模式，羅默及巴肯所分別提出的模式似乎比較切合迪傑斯的要求。

羅默堅持雖然前蘇聯解體及東歐共產陣營解體，但是社會主義「未死」（Roemer, 1992），並認為前蘇聯陣營的崩潰是共產主義政經體系的失敗，而並非公共所有制的失敗，社會主義者必須設計可行的公共所有制。另外，羅默指出共產主義政經體系沒有在計劃制定者、企業管理者和勞動者之間建立有效監督和激勵機制，因而違背社會主義的本意（Roemer, 1994: Chap.5）。

根據羅默的想法，在市場社會主義政經模式下，大部分的資源（包括勞動力）是由價格系統分配，而公司的利潤在一定程度上是平均地分配予全民的，但不同市場社會主義的版本分別在於如何達到這個目標。羅默所提出的模式有四個基本特徵：（1）建立票卷形式的公有制經濟（“coupon economy”），將全國所有的企業的資產以票卷形式平等地分配給所有的成年居民，這種票卷可以在票卷市場上交換和流通，卻不允許跟貨幣交換；（2）平等地分配企業利潤，讓勞動者憑票卷可獲得自己企業和其他企業的紅利，而紅利的多少取決於企業經營

的效益；（3）計劃體制通過差別利率對投資進行管理；（4）同時以政治民主作為後盾來保證其良好運作。

羅默所提出的模式的特點是上述的票卷經濟（Roemer, 1996: 20）。每一個成年公民接受相同數量的票卷，票卷只能用來購買互惠基金的股份，互惠基金只能用所收到的票卷去購買公司的股份，公司股票及互惠基金的價格則是按照公司及基金股份的供求而決定，民眾可自由贖回投放在任何某一個基金的票卷並將其投放在另外的基金。民眾得從其投放的基金所投資的公司組合中分享部份利潤，而民眾所分得的票卷於過世後要回歸政府。按照漢奈爾的所有權模型來分析，全民間接擁有企業佔有權 R_1 及收入權 R_4 。

與威斯哥夫的模式相比，在羅默的模式下，企業利潤並不是直接平均地發放給每位公民，而是透過票卷的方式對企業的利潤提出訴求。由於每位公民的票卷可自由轉讓，這樣的安排會激發他們積極關注各企業的表現，亦間接提供更多市場的訊息。

羅默的模式所展示的是一種公共所有制，確實屬於社會主義的一種模式。羅默當然認為其市場社會主義模式比資本主義優勝，他提供了一系列運算結果證明票卷經濟可以大大改善很多人的收入（Roemer, 1994: 133ff）。羅默意識到從 1970 年代開始，美國國家收入不斷增加，但大部分民眾的實際收入卻停滯不前，他認為在其建議的模式下，由不平等所引發的邪惡如政治賄賂等亦會相繼減少。羅默認為其模式的另外一個優點是減少能產生利潤的公惡（“public bads”）。很多的公惡如污染常常隨著利潤的提昇而增加。假如利潤集中在少數人身上，那麼社會上必然出現比一般大眾不顧公共利益的一撮人，由於權勢及財力，他們容易逃避責任，讓利潤平等化能減少其影響。

相對於羅默，巴肯提出了相似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巴肯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參考了日本的“*keiretsu*”（Bardhan, 1993: 147），銀行有固定聯繫的企業群組，每個公司和銀行都擁有集團內其他公司的部分股份。在這一點上，巴肯的理論模式與史威卡特的模式有點相似。每個公司的董事會都包括集團內其

他公司和銀行的代表。公司的部分利潤交給國家，由全體公民分享，部分利潤按集團內其他公司所佔有該公司的股份分給其他公司，由集團內其他公司的勞動者享有。因此，每一位勞動者不單能獲得社會所有制下公司上繳給政府的利潤，亦能分享整個企業集團內其他公司的利潤。按照漢奈爾的所有權模型來分析，全民是間接擁有企業佔有權 R_1 及直接擁有收入權 R_4 。

利潤分散的作用是建立集團企業群內部相互監督並保證利潤的最大化。如果集團企業群內某企業不能保證利潤最大化，擁有該企業股票的其他公司就會把股票賣給銀行。銀行會對該企業施加壓力，迫使該企業改善經營。因此，巴肯的方案是要創建一種集團企業群內分散公司監督的機制，把公司管理者的責任分散到集團內所有公司和銀行，以便各公司和銀行能夠互相監督。巴肯的方案比羅默的票卷經濟更注重企業利潤分配和分散監督機制。

綜合以上的分析，羅默及巴肯所提出的模式與米勒等人所提出的模式之間其中一項最大的差別是前者強調廠長負責爭逐盈利的企業，而後者則強調企業民主。按照漢奈爾的所有制模型來分析，兩者在這方面的差別在於管理權的配置上，以合作社企業為主的模式中管理權比較分散，而在羅默的廠長負責模式中，管理權則顯得非常集中。當中的分歧完全在於平權與效率之爭以及民主與專業之爭。

另外一項最大的差別是在收入權上，在米勒所提出的模式中，某企業裡的某員工的收入只跟他的付出及其公司的收入掛鉤，跟其他公司的表現毫無瓜葛，亦即是說，他對其他公司所使用及管理的財產沒有收入權。在羅默及巴肯的模式中，除了工作上的收入外，一個有工作的人的收入還包括因為他的公民身份所分享到其他公司的利潤，亦即是說，他對所有其他公司所擁有的財產持有收入權。

伍、結論

市場社會主義對後共產時代的社會主義可行模式的發展方向有很大的啟發。不管是馬克思型還是非馬克思型社會主義者，他們都視市場社會主義為一種值得探討的模式。不同的當代市場社會主義理論雖同屬左派，但各理論模式有其歷史及理論背景。不過，縱使形成背景有所不同，當代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共同的願望，就是發展有別於前蘇聯的計劃經濟與國家所有制體系以外的社會主義政經模式。

本文所討論的三種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各具特色，那一種比較合適要視乎具體的客觀環境。事實上，米勒及羅默對於各自的模型是否應該立刻能在經濟發展比較落後的地方實踐持有相當保留的態度，他們以前蘇聯及東歐等國在後共產時代初期的情況為例（Roemer, 1994: 124ff; Miller, 1991/1994: 261ff）。在缺乏足夠的法規及先進資本主義制度的情況下，勉強實踐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很有可能會產生反效果。相對而言，洛夫的混合模式對後共產主義國家的衝擊不會那麼大，原因是洛夫的模式仍然保留不少的國有企業。

透過上述以漢奈爾的所有權模式作為架構，我們對於當代最主要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中的所有制作出分析，亦進一步肯定所有制在政經模式的討論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市場社會主義的支持者認定市場社會主義在政治道德上要比資本主義優越。然而，不同的市場社會主義者為他們所建議的模式提出不同的政治道德論述。若要更徹底了解一種市場社會主義的政經模式，便要探討其政治道德原則。

對市場社會主義者而言，重點並不是歷史唯物論是否合理。不過，即使歷史唯物論並不可信，市場社會主義者亦不能輕鬆地否定共產主義在政治道德上的正當性。既然市場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一樣在實踐都未能取得成功，我們為何要選擇市場社會主義而非共產主義？另外，市場社會主義在政治道德上又為何比自由資本主義優勝？最後，在理論的一致性上，論者

們各自提出的政治道德考量是否能夠成爲他們所分別建議的模式之規範性基礎？這些都是進一步探討當代市場社會主義理論所必須關注的課題。

參考文獻

- 梁文韜 (2001): <鄧小平理論與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發展的前景>, 收入陳祖爲、梁文韜主編,《政治理論在中國》, 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頁 233-256。
- (2003): <市場社會主義與社會正義: 兼論達維米勒對市場的辯護>,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第七期, 2003 年 12 月, 頁 41-85。
- Albert, Michael, and Robin Hahnel. (199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articipatory Econom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2). "Participatory Economics." *Science and Society* 56: 39-59.
- (2002). "In Defence of Participatory Economics." *Science and Society* 66: 7-21.
- Arneson, R. J. (1987). "Meaningful Work and Market Socialism." *Ethics* 97: 517-545.
- (1992). "Is Socialism Dead? A Comment on Market Socialism and Basic Income Capitalism." *Ethics* 102 (3): 485-511.
- (1993). "Socialism as the Extension of Democracy."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10 (2): 145-171.
- Baker, J. (1987). *Arguing for Equality*. London: Verso.
- Bardhan, P. and Roemer, J. E. (1991). "Market Socialism: A Case for Rejuven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6: 101-116.
- (Eds.) (1993). *Market Socialism: The Current Deb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rdhan, P. (1993). "On Tackling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 in Market Socialism.” In *Market Socialism: The Current Debate*, edited by P. Bardhan and J. Roem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45-155.
- Blackburn, R. (1991). *After the Fall: The Failure of Communism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London: Verso.
- Brus, W. (1972). *The Market in a Socialist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73).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Social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75). *Socialist Ownership and Political System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85). “Socialism – Feasible and Viable?” *New Left Review* 153: 43-62.
- (1990). “Product Market and Capital Market in the Light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Hungarian New Economic Mechanism.” In Oleg T. Bogomolovv (Ed.), *Market forces in Planned Economie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 Brus, W. and Laski, K. (1989). *From Marx to the Market: Socialism in Search of an Economic System*. Oxford: Clarendon.
- (1988) “Capital Market and the Problem of Full Employ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3 (2,3) : 439-447.
- Campell, A. (2002). “Democratic Planned Socialism: Feasible Economic Procedures.” *Science and Society* 66: 29-42.
- Cohen, G. A. (1978).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2000). *If You're an Egalitarian, How come you're so Rich?*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rosland, A. (1964).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London: Cape.
- De Jasay, A. (1990) “Market Socialism: A Scrutiny ‘This Square Circle.’” Occasional Paper 84,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 Devine, P. (1988). *Democracy and Economic Plann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Self-Governing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 (1992). "Market Socialism or Participatory Planning?"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4: 67-89.
- (2002). "Participatory Planning Through Negotiated Coordin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66: 72-85.
- Elster, J. and Moene, K.O. (1987). *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ston, D. (1988). "Market Socialism or Socialization of Market?" *New Left Review* 172: 1-34.
- Estrin, S. (1983). *Self-management: Economic Theory and Yugoslav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9). "Workers' Co-operatives: Their Merits and Their Limitations." In *Le Grand and Estrin*: 165-192.
- Estrin, S. and J. Le Grand, (Eds.). (1989). *Market Socialism*. Oxford: Clarendon.
- Hayek, F. A. (1935).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Honore, A. M. (1961). "Ownership." In A. G. Guest (Ed.). *Oxford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rvat, B., Mihailo Markovic and Rudi Supek (Eds.). (1975). *Self-Governing Socialism, Vol. I*. New York: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 Kornai, J. (1990).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New York: W. W. Norton.
- (1993). "Market Socialism Revisited." In *Bardhan and Roemer*: 42-68.
- (2000). *Evolution of the Hungarian Economy, 1848-199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aibman, D. (2002). "Democratic Coordination: Towards a Working Socialism For the New Century." *Science and Society* 66: 116-129.
- Lawler, J. (1998). "Marx as Market Socialist." In B. Ollman ed., *Market Socialism: the Debate among Socialists*. London: Routledge, 1998.
- Lavoie, D. (1985). *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ndel, E. (1968).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2nd edition, London: Merlin.
- (1986). "In Defence of Socialist Planning." *New Left Review* 159: 5-37.
- (1988). "The Myth of Market Socialism." *New Left Review* 169: 108-120.
- Miller, D. (1981). "Market Neutrality and The Failure of Co-operativ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1: 309-329.
- (1987a). "Marx, Communism, and Markets." *Political Theory* 15: 182-204.
- (1987b). "Market Socialism." In D. Miller (ed.)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 317.
- (1989). *Market, State, and Community: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Market Socialism*. Oxford: Clarendon.
- (1994). "A Vision of Market Socialism," *Dissent*, Summer (1991): 406-414, reprinted in F. Roosevelt and D. Belkin eds., *Why Market Socialism? A Voice From Dissen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4, pp. 247-263.
- (1997) "Equality and Justice," *Ratio* 10: 222-237.
- (1999). *Principles of Social Just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urrell, P. (1983). "Did the Theory of Market Socialism

- Answer the Challenge of Ludwig von Mises?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Socialist Controvers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5: 92-105.
- Nove, A. (1983).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1987). "Markets and Socialism." *New Left Review* 161: 98-104.
- (1988). "Socialism, Capitalism, and The Soviet Experience."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6: 235-251.
- (1989). "The Role of Central Planning under Capitalism and Market Socialism," in J. Elster and K.O. Moene (eds.), *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98-109.
- (1991).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Revisited*. 2nd edition,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Ollman, B. (Ed.) (1998). "Market Mystification in Capitalist and Market Socialist Societies." In B. Ollman (ed.), *Market Socialism: the Debate among Socialists*. New York: Routledge.
- Pejovich, S. (1990). "A Property-Right Analysis of the Yugoslavia Miracle," *The Annal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07, pp.123-132.
- Pierson, C. (1995). *Socialism After Communism: The New Market Socialism*.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Roemer, J.E. (1988). *Free to Choos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2a). "The Morality and Efficiency of Market Socialism." *Ethics* 102 (3) : 448-464.
- (1992b). "Can there be Socialism after Communism?" *Politics and Society* 20: 261-276.
- (1994). *A Future for Social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5). "A Future for Socialism." In Erik Olin Wright (ed.), *Equal Shares*. London: Verso.

Schweickart, D. (1980). *Capitalism Or Worker Control? An Ethical and Economical Appraisal*. New York: Praeger.

----- (1987). "Market Socialist Capitalist Roaders: A Comment on Arnold's 'Marx and Market Socialism.'"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3: 308-319.

----- (1993). *Against Capi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aw, W. (1978).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von Mises, L. (1935).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In *Hayek*, pp. 87-130.

----- (1951).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Weisskopf, T. (1992). "Toward a Socialism for the Future, in the Wake of the Demise of Socialism of the Past."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4 (3/4) : 1-28.

----- (1993). "A Democratic-Enterprise-Based Socialism." In *Market Socialism: The Current Debate*, edited by. P. Bardhan and J. Roem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20-144.

----- (1994). "Challenges to Market Socialism: A Response to Critics." Reprinted in *Why Market Socialism?* Ed. F. Roosevelt and David Belkin, New York: M. E. Sharpe, pp. 297-318.

An Analysis of the Ownership Models in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Market Socialism

Man-To Leung*

Abstract

The fall of communist regimes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th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w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leftist intellectuals and stimulated various kinds of feedbacks. On the one hand, from the Marxist point of view, the fall does not imply the failure of Marxism. This is because the former Soviet bloc did not pass through the stage of advanced capitalism which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transition. The collapse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is due to this immature transi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llapse forces the left to think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an alternative to both capitalism and communism. Some of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s promote market socialism as the alternative and believe that this is the way by which the reform of the former Soviet bloc may follow. Market socialists have different proposals, but all these proposals share a common belief in public ownership.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various systems of ownership in these different major models.

Key words: Political Economy, Ownership, Capitalism, Communism, Market Socialism.

* Assistant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